

怎样看待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卜宪群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立国中原的历代王朝长期处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因此,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便成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必须时刻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今天的史学家在回顾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时,也不得不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提高到影响中华文明的兴衰、导致王朝周而复始的高度。其中的某些观点固然未必完全正确,还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它提示我们探求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类型

今日“中国”的概念和疆域大体是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形成的,正式成国名则在辛亥革命以后,历史上的“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自秦代以后建立的历代王朝无论出于哪个民族,都试图以问鼎中原为己任,因为中原地区拥有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一旦占据中原也就意味着占有了庞大的社会财富,拥有了“正统”的政治地位。历代中原王朝以汉族为主体,但并不都是汉族建立的。无论是谁入主中原,由于历史上的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族群众多,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总是不断呈现出内倾化的趋向。为了抵御这些民族的威胁,保护中原王朝能够控制的地域,稳定其统治秩序,统治者必须竭力思考各种办法和对策。因而,如何处理与这些周边民族的关系就成了历史上许多王朝面临的棘手问题,但又是不得不必须面对的事实。自秦汉时期开始,华夏族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民族——汉族。先秦时代的少数民族有的融合进了汉族,有的还继续保持独立状态。与此同时,在汉族的周边又不断出现新的少数民族。历代统治者尽管都声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很多时期并没有把这些少数民族都统一到帝国的疆域里来,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综合分析历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方式,大体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中原王朝设立行政机构对周边民族进行直接统治,并将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国家各级管理机构中来。秦汉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汉景帝时改为“大行令”,武帝改为“大鸿胪”,是专门管理周边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与县一级平行的还有“道”,设立于有“蛮夷”,即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其目的显然与管理少数民族有关。在秦汉的各项制度中,道和县一样要接受中央的直接管理。三国至北魏,各朝大都设有大鸿胪,并置谒者仆射或鸿胪卿等官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唐代中央的鸿胪寺中有专门机构管理周边民族事务,管理内容十分细密。宋代鸿胪寺既掌管国内少数民族事务,也管理与外国通使等事宜。南宋时,废鸿胪寺,民族事务归礼部管理。明朝恢复鸿胪寺,并设九关通事、外夷通事等官职,掌管少数民族事务。清朝鸿胪寺只管朝会、宾飨赞相礼仪,而将管理民族事务的职能交给理藩院。

历代中原王朝还在征服或能够控制的周边民族地区设置各种机构实施管理,有直接统治,也有间接统治或藩属。如汉代在击败匈奴后先后设置了河西四郡;在征服越族后设置九个郡,采取迁徙的方法使其与汉族融合;在征服贵川数量众多的部族后设立了六个郡进行管理;在征服了朝鲜半岛后设立四郡进行管理。对内徙的一些少数民族设立属国,置属国都尉管理,其内部事务仍由该民族内部组织自行管理。对周边民族进行间接控制的方法,在以后许多王朝都广泛存在。在一些不具备设置郡县的边疆地

区别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如宣帝在控制西域诸国后，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实行政治管理，设护乌桓校尉管理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民族，设使匈奴中郎将主管北边匈奴等等。

历代中原王朝还采取吸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进入国家政权，参与政治管理。例如汉武帝时期出征匈奴的将军公孙贺就是北地义渠人。他的祖父公孙昆邪在汉景帝时封为平曲侯。汉武帝临终前的顾命大臣之一金日磾是匈奴的太子。汉代的军队中有“胡骑”、“越骑”，很多人即来自少数民族。唐太宗说“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唐代不仅许多高官贵族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而且有很多周边民族人物在国家机构中任职。据统计，唐太宗时，突厥各部首领仅在京任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者就有100余人。而历代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同样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杰出人物进入统治阶层，推进其封建化、汉化的过程，如孝文帝、忽必烈时期都是如此。

（二）中原王朝对不能直接管辖的周边民族地区采取羁縻、和亲的政策。《汉书·匈奴传》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羁縻与和亲即属于上述类型之一。

“羁縻”原意指套在牛马头上的笼头：“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所谓“羁縻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在多民族国家里对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先后发展至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时，首先接触到的一个历史事实，便是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汉族地区不一样，因而不可能应用对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统治方式去进行统治。于是，采取什么政策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问题便产生了。随着各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势力的逐步深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政策措施也愈来愈趋于完备，这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建立的由来。唐代羁縻制度十分发达，设羁縻州、羁縻县很多。这些州、县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中旧有的贵族制进行统治；在经济上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尽管统治者有时号称他们羁縻的目的是“不贪其土地，利其人马也”，但实际上也要征收贡纳，只不过会有一定的照顾而已；在文化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持族内原有的社会组织。唐代的羁縻政策，是后来几个王朝土官（土司）制度之渊源。中国古代的羁縻实际是一种高度的自治制度，历史经验表明其有效性是建立在中央政府力量强大之时，中央政府一旦衰落，羁縻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所谓和亲就是以公主、宗室女，有时也以平民女子冒充而出嫁给少数民族首领为妻的一种政治联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维持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学者统计，从西汉到清代，和亲至少有150余次，因此和亲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经常性方法之一。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羁縻的一种，但和亲的关系比羁縻更松散，形式也更复杂。如既有在中原王朝强大时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和亲，也有在中原王朝衰落时被动的和亲。

从历史实际看，以中原王朝为主动的和亲基本都是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如汉武帝与匈奴断绝和亲，却同乌孙和亲，即说明西汉已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根据形势的不同而变通运用。唐朝对回纥、契丹、吐谷浑、吐蕃等民族的和亲，也大多是为了改善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国内政治需要。如唐太宗对与薛延陀的和亲就有对时局的判断，是战还是和？唐太宗分析利弊后最终选择了和亲，也得到朝中重臣的拥护。也有被动的和亲，如汉高祖与匈奴的和亲就是在“白登之围”受到重创后的被迫选择。不同背景下的和亲意义不一样，如汉初的和亲是在屈辱的条件下开展的，汉政府不仅要嫁公主给单于，而且还要奉送给匈奴大量的财物，甚至有时还要忍气吞声地接受侮辱。班固所讲的“卑下而承事之”，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三）中原王朝与周边保持独立的民族政权，呈现出时战时和的状态。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周边还有不少独立的民族政权，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很复杂，可以用时战时和来形容。例如，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就是这种类型之一。匈奴立国后仍然保持游牧民族的特点，生存的需要使他们不断入侵中原。对匈奴的战争构成汉朝军事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汉王朝强大时，匈奴在军事打击的压力下四处迁徙甚至远遁，如东汉北匈奴远迁欧洲。当汉王朝衰弱时他们则伺机入侵。这样一种互动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广泛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时周边民族政权甚至最终击败中原王朝，入主中原，历史上的北魏、元朝、清朝便是如此。

历代中原王朝处理周边民族关系的若干经验教训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败的教训。我们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战与和。历代王朝围绕与周边民族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发生过很多争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周边民族不断干扰中原王朝的正常秩序，或以不平等的关系影响中原人民的安居生活时，中原王朝采取反击的措施是必要的。如汉代开国后相当长的时间与匈奴的关系，是在汉朝采取极端容忍、退让的前提下维持的，匈奴仍时常侵扰边境。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定用战争来制止匈奴的侵扰具有积极意义。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说：“汉武帝要不是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话，那历史就要倒退。”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战争尽管消耗了大量国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匈奴再也不能成为大患。而东汉对羌族的用兵，则是因为东汉统治者对羌族长期的暴虐政策激发起羌人的反抗而引起的，这样的战争毫无正义性可言。历史上中原王朝中开明君主如果能够审时度势，以和为主，以战为辅，往往收到很好的实际效果。如唐太宗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声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权衡利害总体上选择了羁縻和亲的政策，被西北各族称为天可汗。这是他选择以和为主思想的体现，也是他“四海可使如一家”民族思想的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

（二）闭关与开放。我们前面说过，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很复杂，有很多因素影响其间。但对周边民族是开放还是闭关，也往往是影响其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汉初的南越国为例，南越国建立后，刘邦曾派陆贾出使，说服南越王赵佗“称臣奉汉约”。吕后当政时，有大臣提出禁止把中原的铁器及雌性牲口运往南越国，被吕后批准。南越因此派人来中央政府要求撤销禁令，恢复贸易如故，吕后不但不允许反而扣押了使者。赵佗于是再次称帝，派兵北上攻打汉朝。汉文帝时又恢复了安抚政策，不仅继续边境贸易，还修复了赵佗祖坟，年年祭祀，赵佗于是又去帝号恢复臣属的地位。汉代与西域关系的疏通与汉王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保护“丝绸之路”畅通，保护沿途商人使者正常来往，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分不开。在此基础上，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了相当长的时间。唐代在羁縻与和亲政策下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也主要采取的是开放政策。如唐代设立“互市监”管理民族间贸易的各项事务。唐玄宗曾说：“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文化的开放对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也很重要。是闭关还是开放，中原王朝各朝代乃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较为融洽和谐时，也往往是政策较为开放的时期，二者互为因果。当然，历史又是复杂的，中原王朝丰硕的社会财富也是周边民族上层统治者觊觎的对象，因此平等的开放往往只能建立在中原王朝自身力量强大之时，闭关有时也是迫不得已。

（三）“夷夏大防”与“同为一体”。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还深受华夏古老民族观念的影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战争威胁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和民族间的隔阂，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就产生了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形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处理华夏族与非华夏族之间关系的原则。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思想也被封建统治阶级所继承，有着长期的影响。唐玄宗赠给吐蕃中华经典，曾遭到士大夫的激烈反对，认为“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汉武帝平定东瓯、闽越，通西南夷，经营西域，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除了从劳民伤财的角度反对外，主要仍是从夷夏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角度出发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夷夏之防的狭隘民族思想，也有“天下一家”、各民族“同为一体”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同样包括了“用夏变夷”的思想，即要用汉族的礼乐文明改造少数民族，只要他们接受了华夏文明就不再以夷狄视之。尽管这并不是民族文化平等的思想，但历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运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所取得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上有作为的少数民族领袖，如孝文帝、忽必烈积极采用汉化即封建化政策，促进了本民族的历史进步，也是这种文化认同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讲“夷夏大防”还是讲“天下一家”，对于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用大不一样。“夷夏大防”是导致历史上民族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而“天下一家”则是促进民族融合、民族进步的思想基础。

怎样看待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使我们怎样看待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依然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将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与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确区分开来。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一些民族后来演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今天周边一些国家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今天周边的一些国家曾经是历史上中国周边民族，并且是由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管理的。我们叙述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历史，真相要说清楚，不需要回避，但也不能说因为他们历史上曾经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而认为今天仍然是我们的领土，这是根本错误的。

(二) 民族融合与民族凝聚力是主流。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有过很多矛盾和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需掩饰。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武力征服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有一些依靠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后来都崩溃瓦解了。瓦解的原因除了帝国内部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外，各民族之间缺乏凝聚力、向心力也是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则不一样，在斗争的同时更多的是民族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中原王朝的先进文明带动了周边民族的社会进步，周边民族的新鲜血液又给中原王朝注入新的活力。17世纪30年代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的我国土尔扈特部，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游牧生活后，仍毅然摆脱沙皇统治，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就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凝聚力。

(三) 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不能完全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历代中原王朝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全部，今天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今天我们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应当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成与发展的高度。历史上无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还是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曾为民族融合、民族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样，无论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曾有过狭隘的民族心理。如王莽时期的民族关系就是大汉族主义影响下的历史倒退，而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或实行胡汉分治，或仇视汉族先进的政治文明、农耕文明，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我们在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还是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对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分析也是一样，不能站在各自的民族立场上。我们要承认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就应该承认不论汉族或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珍贵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

来源：《光明日报》

栏目编辑：焦艳

发布时间：2011-5-31 15:31:37